

上编综述 风云变幻的八十年

一、鸦片战争前的中国与世界

自公元前 5 世纪的战国时代到 1840 年鸦片战争，中国的封建社会前后延续了两千多年。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中，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经济占主导地位。以个体家庭为单位并与家庭手工业牢固结合的小农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生产结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

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的基本特征是实行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

自汉武帝确立独尊儒术的政策，儒家思想开始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儒家还与佛教、道教相互吸收、融合，共同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封建统治者同时吸收法家思想，严刑峻法，实行专制统治。

中国封建社会的社会结构的特点是族权和政权相结合的封建宗法等级制度。其核心是宗族家长制，突出君权、父权、夫权。

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结构，一方面巩固和维系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稳定和延续，另一方面也使其前进缓慢甚至迟滞，并造成不可克服的周期性的政治经济危机。

鸦片战争前，清王朝闭关自守，故步自封。中国已经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向东方的殖民扩张，使古老的中国遇到了空前严重的挑战，面临着极其深刻的生存危机。

二、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与近代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

清政府实行禁鸦片措施，特别是钦差大臣林则徐于 1839 年 6 月在广东虎门销毁所收缴鸦片的行动，完全是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的正义行动。1840 年 6 月，英国侵华舰队封锁了珠江海口和广东海面。鸦片战争正式爆发。1842 年 8 月 29 日，清政府派钦差大臣耆英、伊里布与英国签订了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1844 年 7 月签订中美《望厦条约》，10 月签订中法《黄埔条约》。

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的封建社会逐步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逐渐开始了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因为如此，鸦片战争就成为近代史的起点。

认识近代社会的性质，就是认识近代中国的基本国情。这是认识近代一切社会问题和革命问题的最基本的依据。

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近代以来中国在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及其与中国封建主义势力相结合的条件下，逐步形成的一种从属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畸形的社会形态。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社会发生了两个根本性的变化：其一，独立的国家逐步变成半殖民地的国家；其二，封建的中国逐步变成半封建的中国。

为什么说独立的国家逐步变成了半殖民地的国家？

这是因为，鸦片战争以后，资本-帝国主义列强通过发动侵略战争，强迫中国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破坏中国的领土主权、领海主权、关税主权、司法主权等，并一步一步地控制中国的政治、经济、外交和军事。中国已经丧失了完全独立的地位，在相当程度上被殖民地化了。近代中国仍然维持着独立国家和政府的名义，还有一定的主权。由于它与名义上的独立没有而由殖民主义宗主国直接统治的殖民地尚有区别，因此被称作半殖民地。

为什么说封建的中国逐步变成了半封建的中国？

这是因为，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用武力打开中国的门户，把中国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和世界市场之中。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给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造成了某些客观条件。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国已经不是完全的封建社会了。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虽然有了某些发展，但是并没有也不可能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

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有以下一些基本特征：

第一，资本-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不但逐步操纵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而且逐步控制了中国的政治，日益成为支配中国的决定性力量。

第二，中国的封建势力日益衰败并同外国侵略势力勾结，成为资本-帝国主义压迫、奴役中国人民的社会基础和统治支柱。

第三，中国自然经济的基础虽然遭到破坏，但是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即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依然在广大地区内保持着，成为中国走向现代化和民主化的严重障碍。

第四，中国新兴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虽然已经产生，并在政治、文化生活中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下，它的发展很缓慢，力量很软弱，而且它的大部分与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都有或多或少的联系。

第五，由于近代中国处于资本-帝国主义列强的争夺和间接统治之下，加上中国地域广大，以及在地方性的农业经济的基础上形成的地方割据势力的存在，近代中国各地区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是极不平衡的。后来，帝国主义列强还分别支持不同的政治势力以分裂中国，使中国处于不统一状态。

第六，在资本-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后来还加上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中国的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日益贫困化以至大批地破产，过着饥寒交迫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

从 1840 年鸦片战争开始，到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中国属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随着近代中国从封建社会逐步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动。近代中国诞生的新兴的被压迫阶级是工人阶级。中国工人阶级最早出现于 19 世纪 40 至 50 年代外国资本主义在华企业中。因此，它是先于中国的资产阶级而产生的，是近代中国最革命的阶级。

中国资产阶级也是近代中国新产生的阶级。主要由一些买办、商人、地主、官僚投资新式企业转化而成。从 19 世纪 70 年代开始，中国民族资本兴办的新式企业逐步发展起来。

三、近代中国的主要矛盾和历史任务

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矛盾中，占支配地位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中国近代社会的两对主要矛盾是互相交织在一起的，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是最主要的矛盾。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临两大历史任务，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这两个任务，是互相区别又互相紧密联系的。由于腐朽的社会制度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阻碍着经济技术的进步，必须首先改变这种社会制度，争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才能为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创造前提，开辟道路。怎样才能争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近代以来的历史表明，必须首先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

第一章 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

一、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

（一）军事侵略

资本-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首先和主要的是进行军事侵略。资本-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军事侵略的主要表现为发动侵略战争，屠杀中国人民；侵占中国领土，划分势力范围；勒索赔款，抢掠财富。

1894年11月，日军在甲午战争中制造了旅顺大屠杀惨案，屠杀中国居民2万余人。

1842年，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把香港岛割让给英国。1860年，又通过中英《北京条约》，割去香港岛对岸九龙半岛南端和昂船洲。

1887年，葡萄牙胁迫清政府订立《中葡和好通商条约》，允许葡萄牙“永居管理澳门”。

沙皇俄国是侵占中国领土最多的国家。沙俄通过强迫清政府签订中俄《璦琿条约》、《北京条约》、《勘分西北界约记》、《改订伊犁条约》和5个勘界议定书，共侵占中国东北、西北15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

1895年，日本强迫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割去中国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和澎湖列岛。

1898年，德国强租山东的胶州湾，把山东划为其势力范围。沙俄强租辽东半岛的旅顺口、大连湾及其附近海面，以长城以北为其势力范围。英国强租山东的威海卫和香港岛对岸的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北、深圳河以南及附近的岛屿（新界），以长江流域为其势力范围。1899年，法国强租广东的广州湾及其附近水面，把广东、广西、云南作为其势力范围。日本也声明把福建作为其势力范围。

1845年，英国租得上海外滩附近837亩土地，设立上海英租界。以后直至1911年，英、法、美、德、日、俄等国，先后在上海等16个城市，设立了30多个租界。租界里俨然是“国中之国”。

1901年《辛丑条约》规定，外国军队有权在北京使馆区和北京至大沽、山海关一线包括天津、唐山等12处“留兵驻守”。日俄战争后，日本在旅顺设置“关东总督府”，并派兵驻守上述地区及南满铁路沿线。这支军队后来被称作“关东军”，成了日本侵略中国的突击队。

《南京条约》赔款2100万元（银元）。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法各得赔款800万两白银。甲午战争后，日本通过《马关条约》强迫中国赔款2亿两白银，“赎辽费”3000万两。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时签订的《辛丑条约》，规定中国应支付的赔款额竟高达4.5亿两白银，分39年还清，本息合计近10亿两之巨。

1860年10月，英法联军放火焚烧了圆明园和附近香山、万寿山、玉泉山的殿阁建筑。

（二）政治控制

近代中国，资本-帝国主义列强对华政治控制的手段包括控制中国的内政外交、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扶植、收买代理人等。

《天津条约》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允许外国公使常驻北京。

资本-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还享有领事裁判权。1843年中英《五口通商章程》规定，在通商口岸，中国人如与英侨“遇有交涉诉讼”，英国领事有“查察”“听诉”之权。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更扩大领事裁判权的范围，即所有美国人在华之一切民事、刑事诉讼，“均由本国领事等官询明办理”。

把持中国海关，是外国侵略者控制中国政治的重要手段之一。中国海关的高级职员全部由外国人充任。英国人赫德自1863年任总税务司开始，直到1908年回国，掌握中国海关大权达40余年之久。

（三）经济掠夺

资本—帝国主义列强对近代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方式除了强迫中国支付巨额的战争赔款外，还包括控制中国的通商口岸、剥夺中国的关税自主权、实行商品倾销和资本输出、操纵中国的经济命脉。

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实行闭关政策，只允许外国商人在广州一地贸易，而且必须经过官方指定的公行即“十三行”进行。1842年《南京条约》规定，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5个港口城市为通商口岸。1858年《天津条约》又规定，开放南京、镇江等10个口岸。1860年《北京条约》又增开天津为通商口岸。陆路方面，清政府还向俄国开放伊犁、喀什噶尔等商埠。这些通商口岸大多成了资本-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基地。

1842年《南京条约》规定，英国商人进出口货物的税率，清政府均宜“秉公议定则例”。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进一步规定，倘中国以后要变更税例，必须得到对方“议允”，正式把协定关税的条款订入条约。中国逐步丧失了关税自主权。

资本-帝国主义列强凭借不平等条约所赋予的种种特权，把中国变成了它们倾销商品的市场和取得廉价原料的基地。

资本-帝国主义列强还利用不平等条约赋予的特权，在中国自由开工厂、办银行、修铁路、开矿山等，获取超额利润。1895年以后，由于《马关条约》规定允许外国人在中国办工厂，使列强对中国的经济侵略进入了“资本输出时期”，外国资本家争先恐后地涌向中国投资。

资本-帝国主义列强不仅勒索中国的赔款，而且迫使中国举借外债来偿付这些赔款。它们还通过贷款，来支持中国反动政府镇压人民革命。中国政府举借外债，主要是以关税和盐税为担保的。外国列强直接控制了这两项税收，就等于扼住了中国财政的咽喉。

外国资本在中国设立的银行，是它们对中国进行资本输出的枢纽。

总之，资本-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使中国在经济上也丧失了独立性，中国被纳入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成了西方大国的经济附庸。除了沿海、沿江少数城市的经济得到畸形繁荣以外，中国广大地区特别是农村的经济都濒临破产。外国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的联合统治，导致了近代中国经济的落后和人民的贫困。

（四）文化渗透

资本-帝国主义列强在对华实行军事侵略、政治控制、经济掠夺的同时，还对华进行文化渗透。其目的是宣扬殖民主义奴化思想，麻醉中国人民的精神，摧毁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

近代中国，资本—帝国主义列强对华文化渗透主要表现在披着宗教外衣，进行侵略活动，为侵略中国制造舆论。

二、抵御外国武装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

1841年5月，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是中国近代史上中国人民第一次大规模的反侵略武装斗争，显示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和敢于斗争的英雄气概。

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后期，太平军曾多次重创英、法侵略军和外国侵略者指挥的洋枪队“常胜军”“常捷军”。

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台北人民闻讯鸣锣罢市，反对割台。在日本统治台湾的半个世纪里，台

湾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从未间断过。

1900年6月，英国海军中将西摩指挥的八国联军2000多人，从天津乘火车向北京进犯，在廊坊遭到义和团的阻击。

在历次反抗外国侵略的战争中，爱国官兵表现了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中法战争期间，1884年8月，法舰进犯台湾基隆，同年10月，又进犯淡水，都被督办台湾事务大臣刘铭传指挥守军击退。1885年3月，在中越边境镇南关，老将冯子材率部大败法军，取得镇南关大捷。在抗击外国侵略的战争中，许多爱国官兵英勇献身。如：鸦片战争期间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江南提督陈化成、副都统海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提督史荣椿、乐善，中日甲午战争时致远舰管带邓世昌、经远舰管带林永升等，都以身殉国。

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争夺和瓜分的图谋，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达到高潮。

义和团运动与列强瓜分中国图谋的破产帝国主义列强并没有能够实现瓜分中国的图谋。其原因何在？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华民族进行的不屈不挠的反侵略斗争。正是包括义和团在内的中华民族为反抗侵略所进行的前赴后继、视死如归的战斗，才粉碎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和灭亡中国的图谋。

由于当时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认识还停留在感性认识的阶段，义和团运动存在着笼统的排外主义的错误；由于认识不到帝国主义联合中国封建地主阶级以压迫中国人民的实质，义和团曾经蒙受封建统治者的欺骗；由于小生产者的局限性，义和团运动中还存在着迷信、落后的倾向。但是，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不容抹煞：义和团运动在粉碎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斗争中，发挥了重大的历史作用。

三、反侵略战争的失败与民族意识的觉醒

（一）反侵略战争的失败及其原因

反侵略战争失败原因，从中国内部因素来分析，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社会制度的腐败，一是经济技术的落后。而前者则是更根本的原因。因为正是由于社会制度的腐败，才使得经济技术落后的状况长期得不到改变。

指出经济技术的落后是中国反侵略战争失败的重要原因，并不意味着经济技术落后的中国就不应当进行反侵略战争或在战争中一定打败仗。因为“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而当时的中国，不仅武器装备等很落后，而且反动统治阶级实行错误的方针、政策，并压制人民群众的动员。这样，中国的反侵略战争一再遭到失败，才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二）民族意识的觉醒

林则徐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主持节译了英国人慕瑞的《世界地理大全》，编成《四洲志》一书。魏源在1843年1月编成《海国图志》，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主张学习外国先进的军事和科学技术，以期富国强兵，抵御外国侵略。

19世纪70年代以后，早期维新思想的代表人物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等人不仅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同时也要求吸纳西方的政治、经济学说。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具有比较强烈的反对外国侵略、追求中国独立富强的爱国思想，以及具有一定程度反对封建专制的民主思想。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还只是少数人有朦胧的民族觉醒意识。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当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时，中国人才开始有了普遍的民族意识的觉醒。

1895年，严复写了《救亡决论》一文，响亮地喊出了“救亡”的口号。在甲午战争后，严复翻译了《天演论》（1898年正式出版）。他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进化论思想，为这种危机意识和民族意识提供了理论根据。孙中山1894年11月在创立革命团体兴中会时喊出了“振兴中华”这个时代的最强音。

第二章 对国家出路的早期探索

一、太平天国农民战争

1843年，洪秀全撷取原始基督教教义中反映下层民众要求的平等思想和某些宗教仪式，从农民斗争的需要出发，加以改造，创立了拜上帝教。

1851年1月，洪秀全率拜上帝教教众在广西省桂平县金田村发动起义，建号太平天国。1853年3月，占领南京，定为首都，改名天京，正式宣告太平天国农民政权的建立。

《天朝田亩制度》是最能体现太平天国社会理想和这次农民起义特色的纲领性文件。它确立了平均分配土地的方案，希望建立“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所以，《天朝田亩制度》实际上是一个以解决土地问题为中心的比較完整的社会改革方案。

《天朝田亩制度》的主张，从根本上否定了封建社会的基础即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体现了广大农民要求平均分配土地的强烈愿望，是对以往农民战争中“均贫富”“等贵贱”和“均平”“均田”思想的发展和超越，具有进步意义。不过，它并没有超出农民小生产者的狭隘眼界。它所描绘的理想天国，仍然是闭塞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传统生活方式；同时又是一个没有商品交换的和绝对平均的社会。这种社会理想，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不切实际的空想的性质。实际上，《天朝田亩制度》中的平分土地方案即使在太平军占领地区也并未能付诸实行。

《资政新篇》是太平天国后期颁布的社会发展方案，是一个具有资本主义色彩的方案。但是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未能付诸实施。

1856年9月，发生了太平天国内部自相残杀的天京事变。东王杨秀清、北王韦昌辉先后被杀，翼王石达开率部出走败亡。天京事变严重地削弱了太平天国的领导和军事力量，成为太平天国由盛转衰的分水岭。

1864年7月，天京被湘军攻破。太平天国起义失败。

太平天国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和重大的历史意义。

太平天国起义沉重打击了封建统治阶级，强烈撼动了清政府的统治根基。这次起义历时14载，起义军转战18省，并建立了与清王朝对峙的政权。加速了清王朝的衰败过程。

太平天国起义是中国旧式农民战争的最高峰。它把千百年来农民对拥有土地的渴望在《天朝田亩制度》中比较完整地表达了出来。《资政新篇》则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比较系统的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这反映了太平天国某些领导人在后期试图通过向外国学习来寻求出路的一种努力。因此，太平天国起义具有了不同于以往农民战争的新的历史特点。

太平天国起义也冲击了孔子和儒家经典的正统权威。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

太平天国起义还有力地打击了外国侵略势力。

在19世纪中叶的亚洲民族解放运动中，太平天国起义是其中时间最久、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一次。它和其他亚洲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汇合在一起，冲击了西方殖民主义者在亚洲的统治。

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失败的原因和教训是深刻的。

农民阶级不是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无法克服小生产者所固有的阶级局限性，缺乏科学思想理论的指导，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因而无法从根本上提出完整的、正确的政治纲领和社会改革方案。

太平天国后期无法制止和克服领导集团自身腐败现象的滋生，领导集团的一些人在生活上追求享乐，在政治上争权夺利，无法长期保持领导集团的团结。这些都大大削弱了太平天国的向心力和战斗力。

太平天国是以宗教来发动、组织群众的，但是，拜上帝教教义不仅不能正确指导斗争，而且给农民战争带来了危害。

太平天国的领袖们对于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还缺乏理性的认识。

太平天国起义及其失败表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民具有伟大的革命潜力；但它自身不能担负起领导反帝反封建斗争取得胜利的重任。单纯的农民战争不可能完成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

二、洋务运动的兴衰

（一）洋务事业的兴办

为了挽救清政府的统治危机，封建统治阶级中的部分成员如奕、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主张引进、仿造西方的武器装备和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创设近代企业，兴办洋务。这些官员被称为“洋务派”。对洋务派兴办洋务事业的指导思想最先作出比较完整表述的是冯桂芬。他在《校邠庐抗议》一书中说：“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这个思想后来被进一步概括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从 19 世纪 60 到 90 年代，洋务派举办的洋务事业归纳起来有三方面：

（1）兴办近代业

洋务派首先兴办的是军用工业，这些企业都是官办的。1865 年，曾国藩支持、李鸿章筹办的上海江南制造总局，是当时国内最大的兵工厂；1866 年，左宗棠在福建创办的福州船政局是当时国内最大的造船厂。

洋务派还兴办了一些民用企业。这些企业除少数采取官办或官商合办的方式外，多数都采取官督商办的方式。其中最重要的官督商办企业有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天津电报局和上海机器织布局，都是李鸿章筹办或控制的。这些官督商办的民用企业，基本上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企业。

（2）建立新式海陆军

从 19 世纪 70 到 90 年代，分别建成福建水师、广东水师、南洋水师和北洋水师。其中北洋水师是清政府的海军主力，一直归李鸿章管辖。

（3）创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

洋务派创办的新式学堂主要有三种：一为翻译学堂，如京师同文馆，主要培养翻译人才；一为工艺学堂，培养电报、铁路、矿务、西医等专门人才；一为军事学堂，如船政学堂等，培养新式海军人才。在创办新式学堂的同时，还先后派遣赴美幼童和官费赴欧留学生 200 多人。

（二）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及失败

洋务派兴办洋务新政，主要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并不是要使中国朝着独立的资本主义方向发展。洋务派提出“自强”“求富”的主张，通过所掌握的国家权力集中力量优先发展军事工业，同时也试图发展若干民

用企业，在客观上对中国的早期工业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某些促进作用。

洋务运动时期，为了培养通晓洋务的人才，开办了一批新式学堂，派出了最早的官派留学生，这是中国近代教育的开始。与此同时，还翻译了一批近代自然科学书籍，给当时的中国带来了新的知识，使人们开阔了眼界。

洋务运动时期，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传统的“重本抑末”等观念受到冲击，社会风气和价值观念开始变化，工商业者的地位上升。这一切，都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也有利于社会风气的改变。

甲午战争一役，洋务派经营多年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标志着以“自强”“求富”为目标的洋务运动的失败。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主要是：

首先，洋务运动具有封建性。

其次，洋务运动对列强具有依赖性。

再次，洋务企业的管理具有腐朽性。

三、维新运动的兴起和夭折

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为主要代表人物的资产阶级维新派，采取了下列行动宣传维新主张，即：（一）向皇帝上书。如康有为曾多次向光绪皇帝上书，他在 1895 年曾联合在京参加会试的举人共同发起“公车上书”。（二）著书立说。如康有为写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梁启超写了《变法通议》，谭嗣同写了《仁学》，严复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等。（三）介绍外国变法的经验教训。（四）办学会。著名的有强学会、南学会、保国会等。（五）设学堂。重要的有康有为主持的广州万木草堂、梁启超任中文总教习的长沙时务学堂等。（六）办报纸。影响最大的有梁启超任主笔的上海《时务报》、严复主办的天津《国闻报》以及湖南的《湘报》等。维新派重点放在争取光绪皇帝及其周围的帝党官员的支持上，希望通过他们自上而下地实行变法主张。

维新派与守旧派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论战。论战主要围绕以下三个问题展开：

第一，要不要变法。

第二，要不要兴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

第三，要不要废八股、改科举和兴西学。

维新派与守旧派的这场论战，实质上是资产阶级思想与封建主义思想在中国的第一次正面交锋。论战进一步开阔了新型知识分子的眼界，解放了人们长期受到束缚的思想。通过论战，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在中国得到进一步的传播，戊戌变法运动的帷幕随之拉开。

1898 年 6 月 11 日，光绪帝颁布了“明定国是”谕旨，宣布开始变法，并在此后的 103 天中，接连发布了一系列推行新政的政令，史称戊戌变法，又称“百日维新”。戊戌维新是一场资产阶级性质的改良运动。但是，这些政令和措施并未触及封建制度的根本，所要推行的是一种十分温和的不彻底的改革方案。

“百日维新”只经历了 103 天就夭折了。除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的前身）被保留下来以外，其余新政措施大都被废除。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势力扼杀维新变法的政变，史称“戊戌政变”。光绪皇帝被软禁于中南海瀛台。康有为、梁启超被迫逃亡海外。谭嗣同、刘光第、林旭、杨锐、杨深秀、康广仁 6 人同遭杀害，史称“戊戌六君子”。

戊戌维新运动的意义：

第一，戊戌维新运动是一次爱国救亡运动。

第二，戊戌维新运动是一场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改良运动。

第三，戊戌维新运动更是一场思想启蒙运动。

戊戌维新运动失败的原因：主要是由于维新派自身的局限和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强大的守旧势力的反对。当时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力量还十分微弱，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维新派的势力非常弱小，既没有严密的组织，也不掌握实权和军队，更没有去发动群众。这样，他们就只能把自己实行改革的全部希望寄托在一个没有实权的光绪皇帝身上。维新派本身的局限性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不敢否定封建主义。

其次，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

最后，惧怕人民群众。

戊戌维新作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的第一次表演，竟失败得这么快，这不但暴露了这个阶级的软弱性，同时也说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企图通过统治者走自上而下的改良的道路，是根本行不通的。要想争取国家的独立、民主、富强，必须用革命的手段，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联合统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

第三章 辛亥革命与君主专制制度的终结

一、举起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旗帜

（一）辛亥革命爆发的历史条件

这场革命的发生，是当时民族危机加深、社会矛盾激化的结果，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为了摆脱困境，清政府于 1901 年 4 月成立督办政务处，宣布实行“新政”。此后，陆续推行了一些方面的改革，包括：设立商部、学部、巡警部等中央行政机构；裁撤象营，建立新军；颁布商法商律，奖励工商；鼓励留学，颁布新的学制，并下令从 1906 年起正式废除科举考试。迫于内外压力，清政府又于 1906 年宣布“预备仿行宪政”，并于 1908 年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制定了一个仿效日本实行君主立宪的方案，但又规定了 9 年的预备立宪期限。

预备立宪并没有能够挽救清王朝，反而激化了社会矛盾，加重了危机。主要原因在于，清政府改革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延续其反动统治。1911 年 5 月，在为形势所迫不得不成立的责任内阁里，13 名大臣中满族就有 9 人，其中皇族占 7 人，被讥为“皇族内阁”。这不仅使立宪派大失所望，也使统治集团内部因满汉矛盾和中央与地方矛盾的尖锐而分崩离析。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骨干是一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知识分子群体的出现与戊戌维新运动及 20 世纪初清政府兴学堂、派留学生的措施有关。这些青年学生接触到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思想文化，其中不少人在民族危难加深、群众自发斗争高涨形势的推动下，开始摸索救国救民的新道路。这些青年知识分子，成为辛亥革命的中坚力量。

（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活动

1894 年 11 月，孙中山到檀香山组建了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立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

政府”。

历史进入 20 世纪，随着一批新兴知识分子的产生，各种宣传革命的书籍报刊纷纷涌现，民主革命思想得到广泛传播。1903 年，章炳麟发表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邹容写了《革命军》，以“革命军中马前卒”的名义，热情讴歌革命，号召人民推翻清朝统治，建立“中华共和国”。陈天华写了《警世钟》《猛回头》两本小册子。

在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传播过程中，资产阶级革命团体也在各地次第成立。从 1904 年开始，出现了十多个革命团体，其中重要的有华兴会、科学补习所、光复会、岳王会等。这些革命团体的成立为革命思想的传播和革命运动的发展提供了不可缺少的组织力量。

1905 年 8 月 20 日，在日本东京以兴中会和华兴会为基础成立中国同盟会，孙中山被公举为总理。同盟会以《民报》为机关报，并确定了革命纲领。这是近代中国第一个领导资产阶级革命的全国性政党，它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三）三民主义学说和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

同盟会的政治纲领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1905 年 11 月，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将同盟会的纲领概括为三大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后被称为三民主义。

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包括“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两项内容。一是要以革命手段推翻清朝政府，改变它一贯推行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二是建立中华民族“独立的国家”。孙中山指出，民族主义不是简单的排满，不是针对一切满人，而是要结束清政府的专制统治及其媚外政策。

但是，同盟会纲领中的民族主义没有从正面鲜明地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主张。他们也没有明确地把汉族军阀、官僚、地主作为革命对象，从而给了这部分人后来从内部和外部破坏革命以可乘之机。

民权主义民权主义的内容是“创立民国”，即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这就是孙中山所说的政治革命。

不过，民权主义虽然强调了要建立民主共和国，却忽略了广大劳动群众在国家中的地位，因而难以使人民的民主权利得到真正的保证。

民生主义民生主义在当时指的是“平均地权”，也就是孙中山所说的社会革命。孙中山主张核定全国土地的地价，其现有之地价，仍属原主；革命后的增价，则归国家，为国民共享。国家还可按原定地价收买地主的土地。他试图探讨一种办法，既使中国富强，又避免产生贫富悬殊的现象，避免社会危机。

但是，孙中山的“平均地权”的主张，没有正面触及封建土地所有制，不能满足广大农民的土地要求，在革命中难以成为发动广大工农群众的理论武器。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初步描绘出中国还不曾有过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是一个比较完整而明确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它的提出，对推动革命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积极的影响。

（四）关于革命与改良的辩论

1905 年至 1907 年间，围绕中国究竟是采用革命手段还是改良方式这个问题，革命派与改良派分别以《民报》《新民丛报》为主要舆论阵地，展开了一场大论战。

争论的焦点问题：

- (1) 要不要以革命手段推翻清王朝这是双方论战的焦点。
- (2) 要不要推翻帝制，实行共和。
- (3) 要不要进行社会革命。

这场论战具有重大的意义。通过这场论战，划清了革命与改良的界限，传播了民主革命思想，促进了革命形势的发展。但这场论战也暴露了革命派在思想理论方面的弱点。

二、辛亥革命与建立民国

1911年4月27日黄兴率120余人在广州举行起义，大部在激战中牺牲。其中72位烈士的遗骸被葬于黄花岗，故是役史称“黄花岗起义”。

1911年10月10日晚，驻武昌的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打响了起义的第一枪。起义军一夜之间就占领武昌，取得首义的胜利。革命军在三天之内就光复了武汉三镇，成立了湖北军政府。

1912年2月12日，清帝被迫退位。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终于覆灭。

湖北革命党人起义后，认为非找一个有地位的人物出来主持政务不可，于是把原清军协统（旅长）黎元洪硬拉出来当了都督。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定1912年为民国元年，并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南京临时政府是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性质的革命政权。资产阶级革命派在这个政权中占有领导和主体的地位。南京临时政府制定的各项政策措施，集中代表和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愿望和利益，在相当程度上也符合广大中国人民的利益。

南京临时政府也有它的局限性。例如，企图用承认清政府与列强所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和清政府所欠的一切外债，来换取列强承认中华民国。没有提出任何可以满足农民土地要求的政策和措施，反而以保护私有财产为借口，去维护封建土地制度以及官僚、地主所占有的土地和财产。

1912年3月，临时参议院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法典。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而“以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员、法院行使其统治权”。《临时约法》规定，参议院行使立法权，参议员由各省选派。临时大总统代表临时政府总揽政务。国务总理及各部总长称国务员，辅佐临时大总统负其责任。法院行使司法权。参议院有权弹劾大总统和国务员。《临时约法》还规定，中华民国国民一律平等，享有人身、财产、集会、结社、出版、言论等自由，享有请愿、陈诉、考试、选举与被选举等民主权利。

《临时约法》以根本大法的形式废除了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确认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治制度。它带有革命性、民主性。

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反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目的的革命，是一次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近代历史上，辛亥革命是中国人民为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而奋起革命的一个里程碑，它使中国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第一次巨变），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第一，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势力的政治代表、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清王朝的统治，沉重打击了中

外反动势力，使中国反动统治者在政治上乱了阵脚。在这以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中国再也不能建立起比较稳定的统治，从而为中国人民斗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第二，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政府，使民主共和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并在中国形成了“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的民主主义观念。

第三，辛亥革命推动了中国人民的思想解放。辛亥革命激发了人民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觉醒，打开了禁锢思想进步的闸门。

第四，辛亥革命推动了中国社会变革，促使中国的社会经济、思想习惯和社会风俗等方面发生了新的积极变化。推动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使随后的几年成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革命政府还提倡社会新风，扫除旧时代的“风俗之害”。

第五，辛亥革命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而且推动了亚洲各国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

三、辛亥革命的失败

辛亥革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仍以失败而告终。南京临时政府只存在了三个月便夭折了。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在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势力以及附从革命的旧官僚、立宪派的共同支持下，窃夺了辛亥革命的果实。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

袁世凯窃夺辛亥革命的果实之后，建立了代表大地主和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北洋军阀反动政权。

首先，在政治上，北洋政府实行军阀官僚的专制统治。1913年3月，袁世凯指使心腹收买刺客暗杀了宋教仁。7月至9月，又以武力镇压了南方七省国民党人的“二次革命”。袁世凯公然撕毁《临时约法》，炮制了一个《中华民国约法》，用总统制取代内阁制。不久，他又通过修改《总统选举法》，使大总统不仅可以无限期连任，而且可以推荐继承人。

军阀们为了实行专制统治，不惜投靠帝国主义。袁世凯统治时期，出卖路权、矿权，大肆借款，并签订众多不平等条约。与列强签订“善后大借款”合同。1915年5月，为了让日本支持复辟帝制，他竟然基本接受日本提出的严重损害中国权益的“二十一条”要求。

袁世凯公然进行帝制复辟活动，遭到举国反对，袁世凯只当了83天皇帝就被迫取消帝制和洪宪年号。1917年6月，前清官僚张勋率“辫子军”北上，拥废帝溥仪复辟。这一次复辟的时间更短，仅12天就在全中国人民的声讨中失败了。

其次，在经济上，北洋政府竭力维护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军阀、官僚本身就是大地主，他们还以各种手段兼并土地。军阀与官僚还借助于政治势力，组成官僚买办资本集团，操纵、垄断财政金融和工业、运输业。

最后，在文化思想方面，尊孔复古思潮猖獗一时。

总之，北洋政府从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思想上对辛亥革命进行了全面的反攻倒算。中国重新落入了黑暗的深渊。

1913年宋教仁被刺后，孙中山毅然发动武装反袁的“二次革命”。结果只坚持了两个月就失败了。

1914年，孙中山在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但参加的人数很少，社会影响不大。

1915年12月，蔡锷等在云南组织“护国军”，宣布“独立”，很快形成席卷半个中国的护国运动。

袁世凯死后，皖系军阀头子段祺瑞掌握北洋政府，变本加厉地推行独裁卖国的反动统治，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在这种局面下，孙中山举起了“护法”的旗帜。1917年9月，在广州成立以孙中山为大元帅的护法军政府，并出师北伐。不久，护法运动失败。1919年10月，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已经陷入绝境，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再也不能领导中国革命前进了。

辛亥革命为什么会失败？

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在帝国主义时代，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资本主义的建国方案是行不通的。帝国主义与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大地主大买办势力以及旧官僚、立宪派一起勾结起来，从外部和内部绞杀了这场革命。

这场革命之所以失败，从主观方面来说，在于它的领导者资产阶级革命派本身存在着许多弱点和错误。主要是：

第一，没有提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

第二，不能充分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在革命的过程中，资产阶级革命派虽然也曾经联合新军和会党，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动员了群众的力量，但在清政府被推翻之后，他们便把群众抛弃了。

第三，不能建立坚强的革命政党，作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强有力的核心。同盟会内部的组织比较松懈，派系纷杂，缺乏一个统一和稳定的领导核心。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这些弱点、错误，根源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辛亥革命的失败表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没有能够救中国，先进的中国人需要进行新的探索，为中国谋求新的出路。

中编综述 翻天覆地的三十年

在1919年五四运动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前这个时期，中国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中国人民同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后来又有官僚资本主义）的矛盾；农民仍然是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主力；工人阶级则代替资产阶级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力量。

在这个时期，中国人民继续受到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后来又增加了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这三者，就是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

中国的资产阶级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是依附于外国垄断资本的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后来成为官僚资产阶级）；另一部分是民族资产阶级，即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联系较少并受它们压迫的中等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

1927年国民党在全国的统治建立以后，官僚买办资本急剧地膨胀起来，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这种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是蒋介石反动政权的经济基础。掌握着官僚资本的阶级，就是官僚资产阶级，即中国的大资产阶级。

官僚资本的垄断活动，首先和主要的是在金融业方面开始的。以“四行二局”（“四行”为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央银行和中国农民银行；二局为邮政储金汇业局和中央信托局）为中心的金融垄断体系，直接操纵着全国的经济。官僚资本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严重阻碍。

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所经营的，是中等规模和小规模的资本主义经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受到了多方面的阻碍。

首先，是外国资本的压迫。

其次，是官僚资本的排挤。

再次，是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

最后，是军阀官僚政府的压榨。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很小，它始终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

第二，在民族资本中，工业资本所占的比重小，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所占的比重大。

第三，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主要是以纺织、食品工业为主的轻工业，缺乏重工业的基础，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在技术、设备以至原材料方面不得不依赖外国垄断资本和本国官僚资本。

第四，民族资本所经营的工业，规模狭小，经营分散，技术设备落后，劳动生产率低。产品成本高，在市场上缺乏竞争力。

第五，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和封建势力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上述情况，决定了民族资产阶级是带两重性的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两重性，决定了他们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能够参加反帝国主义和反官僚军阀政府的革命，可以成为革命的一种力量，成为无产阶级的同盟军。而在另一个时期，就有跟在买办资产阶级后面，成为它的助手的危险。

在 1921 年中国共产党诞生至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以前的时期，中国存在着三种主要的政治力量：一是地主阶级和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1927 年后形成为官僚资产阶级）。他们是反动势力、民主革命的对象。其政治代表先是北洋政府，以后主要是国民党统治集团。二是民族资产阶级。他们是中间势力、民主革命的力量之一。其政治代表是民主党派的某些领导人物和若干无党派民主人士。三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他们是进步势力、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其政治代表是中国共产党。三种政治力量分别提出了三种不同的建国方案：

第一种是地主阶级和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的方案。

地主阶级与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同广大人民处于尖锐对立的地位，因而主张继续实行地主阶级、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的军事独裁统治，使中国继续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道路。

第二种是民族资产阶级的方案。

民族资产阶级的基本政治主张，是建立一个名副其实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以便使资本主义得到自由的和充分的发展，使中国成为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社会。

第三种是工人阶级和其他进步势力的方案。

他们的政治代表中国共产党主张，中国人民应当在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下，首先进行一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新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以便建立一个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即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并且经过这个人民共和国，逐步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从根本上说，由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并不具备现实性，可供中国人民选择的方案主要是两个：或

者是继续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或者是创建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

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之所以行不通，是由当时中国所处的时代条件和国内阶级关系的状况所决定的。

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过于软弱。它没有勇气和能力去领导人民进行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从而为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扫清障碍。中国的反动统治者由于自身社会基础的极其狭窄，它不能容忍、更经受不了任何的民主改革。

总体上说，地主阶级与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的方案由于违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遭到了广大中国人民的唾弃，他们的反动统治也在根本上被推翻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方案由于脱离中国实际，也没有得到中国广大群众的拥护，连提出这种方案的大多数人也最终也承认这个方案是行不通的。只有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关于建立人民共和国的方案，逐步成为中国人民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选择。

第四章 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一、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

1919年五四运动以前的新文化运动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新文化反对封建主义的旧文化的斗争。

这个运动是从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开始的。1917年1月，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他聘陈独秀为北大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也随之迁至北京。李大钊、鲁迅、胡适等参加编辑部并成为主要撰稿人。《新青年》杂志和北京大学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

《新青年》提出的基本口号是民主和科学，即所谓拥护“德先生”和“赛先生”。在陈独秀看来，民主，既是指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制度，也是指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思想。科学，则有广狭二义：“狭义的是指自然科学而言，广义是指社会科学而言。”

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认定，为了提倡民主和科学，给发展资本主义扫清思想障碍，必须对孔学进行批判。

五四以前的新文化运动，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盲从，是切中时弊的，在客观上仍然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这些启蒙思想家，是敢于向两千多年来神圣不可侵犯的封建礼教进行自觉挑战的第一批不妥协的战士。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这股潮流冲决了禁锢人们思想的闸门。

五四以前新文化运动的局限五四以前的新文化运动也存在着一些弱点。

第一，从根本上说，提倡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并不能为人们提供一种有效的思想武器去认识中国，去对中国社会进行改造。

第二，他们把改造国民性置于优先的地位。但是，离开改造产生封建思想的社会环境的革命实践，仅仅依靠少数人的呐喊，依靠有限的宣传手段，要根本改造由这种社会环境产生的思想、所造成的国民性，是不可能的。

第三，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他们中有的人看问题很片面，坏就是绝对的坏，好就是绝对的好。这种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方法，影响了这个运动后来的发展。

新文化运动左翼人士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怀疑，推动着他们去探索挽救危亡的新的途径，为他们以

后接受马克思主义准备了合宜的土壤。

这样，后来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就分成了两个潮流：一部分人（如李大钊等）继承了它的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另一部分人（如胡适等）则沿着资产阶级的道路继续走下去了。

中国的先进分子走上马克思主义指引的道路，是他们经过长期的、艰苦的探索之后所作出的一种选择。

1917年俄国爆发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推动中国的先进分子把目光从西方转向东方，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

十月革命是怎样推动中国的先进分子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的呢？

第一，十月革命给予中国人的一个启示是：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也可以用社会主义思想指引自己走向解放之路。十月革命发生在其国情与中国相同（封建压迫严重）或近似（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因而对中国的先进分子具有特殊的吸引力。

第二，十月革命诞生的社会主义俄国号召反对帝国主义，并以新的平等的态度对待中国，有力地推动了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

第三，十月革命中俄国工人、农民和士兵群众的广泛发动并由此赢得胜利的事实，给予中国的先进分子以新的革命方法的启示，推动他们去研究这个革命所遵循的主义。

这样，在十月革命以后、五四运动前后的中国思想界，就产生了一批赞成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社会主义开始在中国形成一股有相当影响的思想潮流。

在中国大地上率先举起马克思主义旗帜的，是李大钊。

在中国，李大钊最早从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1919年9月、11月，他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表明李大钊已经成为中国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1919年5月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事件。这个运动是在新的时代条件和社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

首先，是新的社会力量的成长、壮大。在1914年至1918年世界大战期间，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相当迅速的发展。中国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力量也进一步成长起来。五四运动前夕，中国产业工人已经达到200余万人。这样，五四运动就获得了比以往的革命斗争更加广泛的群众基础。

其次，是新文化运动掀起的思想解放的潮流。受到这个潮流影响的年轻一代知识界，尤其是那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为五四运动准备了最初的群众队伍和骨干力量。

再次，是俄国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

五四运动的直接导火线，是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

迫于人民群众的压力，北洋政府不得不于6月10日宣布罢免亲日派官僚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輿的职务。6月28日，中国政府代表也没有出席巴黎和约的签字仪式。五四运动的直接斗争目标得到了实现。

由于五四运动是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它具有以辛亥革命为代表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所不具备的一些特点。主要是：

第一，五四运动表现了反帝反封建的彻底性。

第二，五四运动是一次真正的群众运动。

第三，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

正因为五四运动具备了上述新的历史特点，它也就成了中国革命的新阶段即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开端。

二、马克思主义进一步传播与中国共产党诞生

中国早期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物，主要有三种类型：

首先，是五四以前的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领袖。其代表除李大钊以外，就是陈独秀。

1920年9月，陈独秀发表《谈政治》一文，表明他站到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来了。

其次，是五四爱国运动的左翼骨干。其代表为毛泽东等。

再次，是一部分原中国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时期的活动家。其代表为董必武等。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队伍，主要是由以上三种人组成的。其中李大钊、陈独秀属于先驱者和擎旗人，毛泽东等五四运动的左翼骨干则是其主体部分。

五四以前的新文化运动主要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新文化反对封建主义的旧文化的斗争，五四以后的新文化运动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马克思主义开始逐步地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发挥指导作用了。

中国工人阶级政党最早的组织，是在中国工人阶级最密集的中心城市上海建立的。时间约在1920年8月，参加者有陈独秀、李汉俊、李达等。

在建党过程中，陈独秀起着重要的作用。他在上海创建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是各地共产主义者进行建党活动的联络中心。

为了扩大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阵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同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流派进行了斗争。

三次论战：

还在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之前，针对胡适提出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主张，李大钊在1919年8月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针对当时中国的现实指出，仅仅依靠“一点一滴的改良”是不行的，社会问题“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

1920年底，张东荪、梁启超挑起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

在这个时期，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还同黄凌霜、区声白等无政府主义者进行了论战。

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的斗争，帮助一批倾向社会主义的进步分子划清了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界限，科学社会主义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流派的界限，推动他们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举行。其间由于会场受到暗探注意和法租界巡捕房搜查，最后一天的会议改在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

参加大会的有12名代表，代表50多名党员。他们是：李达、李汉俊（上海），张国焘、刘仁静（北京），毛泽东、何叔衡（长沙），董必武、陈潭秋（武汉），王尽美、邓恩铭（济南），陈公博（广州），周佛海（日本东京）。包惠僧受陈独秀派遣，出席了会议。出席会议的还有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

大会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党的纲领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废除资本私有制，以及联合第三国际等。

大会在讨论实际工作计划时，决定首先集中精力组织工人。

大会选举产生了由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的党的领导机构——中央局，以陈独秀为书记。

中共一大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近现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中国人民在救亡图存斗争中顽强求索的必然产物。

中国共产党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成立的。一方面，它成立于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修正主义遭到破产之后。它所接受的，是没有被修正主义阉割的马克思主义的完整的科学世界观和社会革命论，是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即列宁主义，是在斗争中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划清了界限的科学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它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工人运动的基础上产生的。中国工人阶级身受帝国主义者、本国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的三重压迫，具有坚强的革命性。在这个阶级中，不存在欧洲那种工人贵族阶层，没有社会改良主义的基础。而且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工人阶级根本不可能进行和平的议会斗争，他们不可能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抱有期望。所以，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为基础的党，是一个区别于第二国际旧式社会改良党的新型工人阶级革命政党。

在当时的中国，在党内，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的党员占有相当大的数量。因此，新生的中国共产党不能不受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严重影响。同时，它是在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情况复杂、经济文化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开始自己的活动的。因此，它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全面地、正确地结合起来，制定出适合中国情况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不能不经历一个曲折的探索的过程，一个在党和人民集体奋斗的基础上逐步积累经验的过程。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个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有了先进的坚强的政党作为凝聚自己力量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义无反顾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中国人民由此踏上了争取民族独立、自身解放的光明的道路，开启了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历史征程。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

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弘扬建党时期的“红船精神”，即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信念、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

三、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一）制定革命纲领，发动工农运动

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中国革命就展现了新的面貌。主要是：

第一，第一次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纲领，为中国人民指出了明确的斗争目标。

1922年7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党在当前阶段的纲领应当是：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统一中国为真正民主共和国。这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条件下，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不可逾越的一个阶段。

第二，开始采取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和政治派别没有采取过、也不可能采取的革命方法，即群众路线的方法。

从1922年1月香港海员罢工到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罢工，中国掀起了第一个工人运动的高潮。在13个月的时间里，全国发生了包括安源路矿工人罢工、开滦五矿工人罢工等在内的大小罢工100余次，参加者在30万人以上。

1921年9月，经过共产党人的努力，浙江萧山县衙前村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农民协会，开展反抗地主压迫的斗争。这种新式的农民运动，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也是不曾有过的。

（二）实行国共合作，掀起大革命高潮

京汉铁路罢工遭到北洋政府的血腥镇压之后，中国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了低潮。中国共产党由此认识到，如果单凭无产阶级的力量，是不能取得胜利的。而要胜利，他们就必须在各种不同的情形下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革命的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所以在二七惨案之后，中国共产党决定采取更为积极的步骤去联合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大体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政党。

1923年6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就国共合作的方针和办法作出了正式的决定。这次国共合作实行“党内合作”，即共产党员、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落入国民党。

孙中山在俄国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在苏俄、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在晚年实现了伟大的思想转变。毅然改组国民党，把国民党改组成为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大会通过的宣言对三民主义作出了新的解释：在民族主义中突出了反帝的内容，强调对外实行中华民族的独立，同时主张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在民权主义中强调了民主权利应“为一般平民所共有”，不应为“少数人所得而私”；把民生主义概括为“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两大原则（后来又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主张），并提出要改善工农的生活状况。这个新三民主义的政纲同中共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基本一致，因而成为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大会实际上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这样，国民党一大的成功召开，就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

国共合作的形成，加快了革命前进的步伐。国共合作创办了黄埔陆军军官学校，为未来的革命战争准备了军事力量的骨干。1925年5月，以五卅运动为起点，掀起了全国范围的大革命高潮。同年7月1日，国民政府在广州建立。随后，将黄埔军校校军和驻广东的粤军、湘军、滇军先后改编为国民革命军。

1926年7月，以推翻北洋军阀统治为目标的北伐战争开始。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基本上摧毁了北洋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的主力。

1925年至1927年中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比之以往任何一次革命，包括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群众的动员程度更为广泛，斗争的规模更加宏伟，革命的社会内涵更其深刻，因此被称作大革命。

在这场革命中，中国共产党起着独特的、不可代替的作用。没有中国共产党，不会有这场大革命。这是因为：

大革命是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政治口号下进行的。而提出这个口号的，正是中国共产党。

大革命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空前广泛而深刻的群众运动。而中国共产党正是人民群众的主要发动者和组织者。

大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是革命战争。共产党人不仅帮助和推动了国民革命军的建立，而且在军队中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积极提高国民革命军的素质，增强它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共产党员在战斗中更是身先士卒，起着先锋作用和表率作用。由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共产党员叶挺任团长的第四军独立团，在北伐中战功卓著，使第四军赢得了“铁军”的称号。

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从客观方面来讲，是由于反革命力量的强大，是由于资产阶级发生严重的动摇、统一战线出现剧烈的分化，是由于蒋介石集团、汪精卫集团先后被帝国主义势力和地主阶级、买办资产阶级拉进反革命营垒里去了。从主观方面来说，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中央领导机关在大革命的后期犯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放弃了无产阶级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使大革命遭到了失败。当时的中国共产党还处在幼年时期，没有经验，缺乏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深刻认识，还不善于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所以，右倾机会主义在大革命后期才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中占据了统治地位。共产国际及其在中国的代表并不真正了解中国的情况，也出了一些错误的主意。幼年的中国共产党还难以摆脱共产国际的那些错误的指导思想。

大革命历史意义：这场失败了的革命，实际上是未来胜利的革命的一次伟大的演习。因为正是在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轰轰烈烈的革命工作，领导了全国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荣的一页，同时开始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途径，初步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并且从大革命的失败中汲取了严重的历史教训，开始懂得进行土地革命和掌握革命武装的重要性。正是由于经历了这场大革命，中国人民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有了明显的提高，中国共产党开始掌握了一部分革命武装。所有这些，为把中国革命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土地革命战争阶段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第五章 中国革命的新道路

一、对革命新道路的艰苦探索

1928年张学良于12月29日从东北发出通告，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这样，国民党就在全中国范围内建立了自己的统治。

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国民党已经不再是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而是变成了一个由代表地主阶级、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反动集团所控制的政党。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依然是地主阶级和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的统治，同北洋军阀的统治没有本质的区别。

国民党所实行的是代表地主阶级、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一党专政和军事独裁统治。

首先，为了镇压人民和消灭异己力量，国民党建立了庞大的军队。

其次，为了镇压人民和消灭异己力量，国民党建立了庞大的全国性特务系统。

再次，为了控制人民，禁止革命活动，国民党大力推行保甲制度。

最后，为了控制舆论，剥夺人民的言论和出版自由，国民党还厉行文化专制主义。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彻底清算了大革命后期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并选出了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临时政治局。毛泽东在会上强调党“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八七会议使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大大前进了一步，开始了从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转折。

1927年8月1日，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及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率领共产党掌握或影响下的北伐军2万多人在南昌举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这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端。9月9日，毛泽东等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起义军公开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在攻打长沙的计划受挫后，起义部队决定南下，向敌人控制比较薄弱的农村区域转移，开始了创建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2月11日，张太雷和叶挺、叶剑英等领导了广州起义。

1928年6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继续把城市工作的复兴视为革命高潮到来的决定条件的同时，肯定了农村根据地和红军是决定革命新高潮的更大的发展基础和重要力量。

以农村为工作重点，到农村去发动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开展武装斗争，建设根据地，这是1927年以后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所要求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革命新道路的开辟，依靠了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凝聚了党和人民的集体智慧。而毛泽东，则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毛泽东不仅在实践中首先把革命的进攻方向指向了农村，而且从理论上阐明了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和农村应当成为党的工作中心的思想，具体体现在毛泽东1928年10月和11月写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1930年1月写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文章中。在实际工作中，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总结群众斗争的经验，创造性地解决了在分散的农村游击战争的环境下，如何加强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以及人民军队的建设、如何开展土地革命、如何进行根据地的各方面建设等等为坚持和发展农村根据地所必须解决的一系列根本问题。

1929年12月下旬，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上杭县古田村召开。这次会议史称古田会议。会议通过的毛泽东起草的决议案，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古田会议决议创造性地解决了在农村环境中、在党组织和军队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环境下，如何从加强思想建设入手，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和建设党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这是人民军队完全区别于一切旧军队的政治特质和根本优势，对于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开辟和坚持具有重要的意义。

随着革命新道路的开辟，中国革命开始走向复兴。到1930年初，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建立了大小十几块农村根据地。

从1930年10月起，蒋介石集中重兵，向南方各根据地的红军发动大规模的“围剿”。从1930年10月到1931年7月，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等指挥下，贯彻积极防御的方针，实行“诱敌深入”“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战术，连续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三次“围剿”。1932年底，又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

毛泽东和邓子恢等一起制定了土地革命中的阶级路线和土地分配方法：坚定地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分土地，在原耕地的基础上，

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这样，中国共产党就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制定了可以付诸实施的比较完整的土地革命纲领和路线。

根据地开展了热火朝天的“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充分调动了广大农民发展生产和参军参战的积极性。在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极其严重的条件下，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得到坚持和发展，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紧紧地依靠了农民，领导农民进行了土地制度的革命。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省瑞金县叶坪村举行。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当选为主席。

二、中国革命在探索中曲折前进

土地革命战争的严重挫折中国革命的复兴和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从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之前，“左”倾错误先后三次在党中央的领导机关取得了统治地位。

第一次是1927年11月至1928年4月的“左”倾盲动错误，认为革命形势在不断高涨，盲目要求“创造总暴动的局面”。

第二次是1930年6月至9月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地认为中国革命乃至世界革命进入高潮，盲目要求举行全国暴动和集中红军力量攻打武汉等中心城市。

第三次是1931年1月至1935年1月以陈绍禹（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其主要错误是：在革命性质和统一战线问题上，混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将反帝反封建与反资产阶级并列，将民族资产阶级视为中国革命最危险的敌人，一味排斥和打击中间势力。在革命道路问题上，继续坚持以城市为中心，将准备城市工人的总同盟罢工和武装起义作为中国共产党最主要的任务；指令根据地的红军采取“积极进攻的策略”，配合攻打中心城市。在土地革命问题上，提出坚决打击富农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主张。在军事斗争问题上，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在党内斗争和组织问题上，推行宗派主义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针。

在20世纪30年代前期、中期，中国共产党内屡次出现严重的“左”倾错误，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八七会议以后党内一直存在着的浓厚的“左”倾情绪始终没有得到认真的清理，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内部事务的错误干预和瞎指挥以外，主要的原因在于：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准备不足，理论素养不高，实践经验也很缺乏，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不了解，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的实践没有统一的理解。一句话，不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全面地、正确地结合起来。

王明等人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对中国革命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危害。其最大的恶果，就是使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遭到失败，不得不退出南方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长征。

1934年10月中旬，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8.6万人撤离根据地，开始长征。

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召开了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集中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批评了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错误。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后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分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成立了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团”，全

权负责红军的军事行动。会议的一系列重大决策，是在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的联系中断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作出的。

遵义会议开始确立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从而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工农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为党和革命事业转危为安、不断打开新局面提供了最重要的保证。

1936年10月，红二、四方面军先后同红一方面军在甘肃会宁、静宁将台堡（今属宁夏回族自治区）会师。至此，三大主力红军的长征胜利结束。

红军的长征宣告了国民党反动派消灭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图谋彻底失败，宣告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肩负着民族希望胜利实现了北上抗日的战略转移，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

长征精神：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

第六章 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

一、日本发动灭亡中国的侵略战争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日本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的阶段由此开始。1932年2月，中国东北全境沦陷。1932年，在日军扶持下拼凑的伪“满洲国”（以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为“执政”，两年后改称“皇帝”），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势力和中国封建复辟残余势力相结合而催生的一个怪胎。中国东北三省成了日本的殖民地。

面对日本的大举侵略，国民党政府一再退让。蒋介石在1931年7月已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

1935年，日本在华北制造一系列事端，向中国政府提出使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中国政府在河北、察哈尔两省的主权大部丧失。接着，日方又策动华北五省（河北、察哈尔、绥远、山西、山东）两市（北平、天津）“防共自治运动”，制造傀儡政权。这就是华北事变。

卢沟桥事变以后，日本动员几乎全部军事力量，采取“速战速决”的战略，向华北、华东、华中地区发起战略进攻。由于遭到中国军民的顽强抵抗，日军在1938年10月占领广州、武汉以后，被迫停止对正面战场的战略性进攻。在坚持灭亡中国的总方针下，日本调整侵华政策，实施“以华制华”和“以战养战”策略，对国民党政府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在占领区加紧扶植傀儡政权，建立和发展汉奸组织；逐步将主要兵力用于对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1938年12月，中国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投降日本。1940年3月，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

日本对中国的大规模侵略和在中国部分地区的殖民统治，犯下了空前严重的罪行，给中华民族造成了极为深重的灾难。

二、中国人民奋起抗击日本侵略者

面对日本的野蛮侵略，中国人民毅然奋起、英勇抵抗，进行了长达十四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国人民在九一八事变后开始的抗日战争，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

中国共产党率先举起了武装抗日的旗帜。1932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布对日作战。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了东北人民的抗日武装斗争。1933年初，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先后在东北各地崛起。1934年，各抗日游击队先后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1936年2月以后，又陆续改建为东北抗日联军。东北抗日联军同日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

国民党军队中的部分爱国官兵自发进行了抗战。1933年5月，原西北军将领冯玉祥在张家口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并谋求同共产党合作。同年11月，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蒋光鼐以及国民党内爱国人士李济深、陈铭枢等在福州发动反蒋抗日事变。这就是福建事变。

在中国共产党关于救亡图存、全民抗战的号召和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的到来。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提出了在抗日的条件下与民族资产阶级重建统一战线的新政策，批评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冒险主义、关门主义的错误倾向。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即将到来时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十年内战的局面由此结束，国内和平基本实现。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守军奋起抵抗日军的进攻。中国开始奋起进行全民族抗战，在东方开辟了世界第一个大规模的反法西斯战场。

8月，国共两党达成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等协议。八路军由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下辖三个师：第一一五师，师长林彪；第一二〇师，师长贺龙；第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接着，南方的红军和游击队，除琼崖红军游击队外，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叶挺任军长。

192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实际承认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以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三、国民党与抗日的正面战场

（一）战略防御阶段的正面战场

从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到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中国抗战处于战略防御阶段。

在战略防御阶段，日本侵略者以国民党军队为主要作战对象。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担负了抗击日军战略进攻的主要任务。国民党军队组织了淞沪、忻口、徐州、武汉会战等一系列大战役。1938年3月，李宗仁等部进行台儿庄战役，取得大捷，歼灭日军1万余人。

国民党军队的爱国将士，表现了空前的民族义愤和抗战热情。在北平南苑的战斗中，第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第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先后阵亡。在淞沪会战中，第八十八师五二四团团附谢晋元率孤军据守四行仓库，被上海市民誉为“八百壮士”。

在这个时期，国民党政府的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但是，正面战场除了台儿庄战役取得大捷外，其他战役几乎都是以退却、失败而结束的。造成这种状况的客观原因，是由于在敌我力量对比上，日军占很大的优势；主观原因，则是国民党战略指导方针上的失误。蒋介石集团实行的是片面抗战的路线，即不敢放手发动和武装民众，将希望单纯寄托在政府和正规军的抵抗上；在战略战术上，没有采取积极防御的方针，而是进行单纯的阵地防御战。

1937年11月，日军攻占上海，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

（二）战略相持阶段的正面战场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对国民党政府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国民党在重申坚持持久抗战的同时，其对内对外政策发生重大变化。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决定成立“防共委员会”，确定了“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方针。蒋介石还将抗战到底的含义解释为“恢复到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这标志着国民党政府逐步转变为消极抗战。

在相持阶段，国民党军队进行过几次较大的战役。国民政府大体上保住了西南、西北大后方地区。1939年12月，在桂南会战中，以第五军为主力的国民党军队曾攻克昆仑关，消灭日军4000余人。1940年5月，在枣宜会战中，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将军在激战中殉国。但是，这个时期国民党对抗战在全局上逐渐趋向消极，基本上实行保守的收缩战略，以便保存实力；同时又抽出相当多的兵力用来限制、打击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制造了多次的反共“摩擦”事件。

1941年12月，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美、英对日宣战。不久，由美国方面提议设立中国战区。1942年，中国远征军进入缅甸对日作战。陆军第二〇〇师师长戴安澜在缅北殉国。

1944年4月至1945年1月，日军发动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的作战。在这次豫湘桂战役中，国民党军队遭到大溃败，越来越多的人对国民党统治集团失去了信任。

四、中国共产党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一）全面抗战的路线和持久战的方针

与国民党实行的片面抗战路线不同，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主张实行全面抗战的路线，即人民战争路线。

1937年8月，中国共产党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制定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强调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关键在于使已经发动的抗战成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

1938年5月至6月间，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的讲演，系统地阐明了持久抗战的总方针。

毛泽东指出，中日战争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20世纪30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一方面，日本是强国，中国是弱国，强国弱国的对比，决定了抗日战争只能是持久战。另一方面，日本是小国，发动的是退步的、野蛮的侵略战争，在国际上失道寡助；而中国是大国，进行的是进步的、正义的反侵略战争，在国际上得道多助。中国已经有了代表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在政治上成熟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和人民军队。因此，最后胜利又将是属于中国的。

毛泽东强调，“兵民是胜利之本”。战胜日本的侵略，必须进行人民战争。

毛泽东还科学地预测了抗日战争的发展进程。即：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其中，战略相持阶段，是中国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最关键的阶段。只要坚持持久抗战、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将在这个阶段中获得转弱为强的力量。

毛泽东阐明的持久战战略思想，揭示了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和坚持抗战、争取抗战胜利必须实行的战略方针，对全国抗战的战略指导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二）敌后战场的开辟与游击战争的发展及其战略地位

1937年9月，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主力在晋东北平型关附近伏击日军，歼敌1000余人，击毁汽车100

多辆，取得全民族抗战以来中国军队的第一次重大胜利，粉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在抗日战争的初期和中期，游击战被提到了战略的地位，具有全局性的意义。

（三）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

中国共产党强调，必须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既统一，又独立。为此，共产党必须保持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力争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权，使自己成为团结全民族抗战的中坚力量。

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持、扩大和巩固，中国共产党制定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总方针。

进步势力主要是指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他们是统一战线的基础，抗日战争的主要依靠力量。为了发展进步势力，就要放手发动人民群众主要是农民群众，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抗日人民武装，创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在全国发展共产党的组织，发展全国民众的抗日运动。

中间势力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和地方实力派。

顽固势力是指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抗日派，即以蒋介石集团为代表的国民党亲英美派。共产党必须以革命的两面政策来对付他们，即贯彻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

（四）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设

加强政权建设，是抗日根据地建设的首要的、根本的任务。中国共产党提出，根据地政权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抗日民主政府在工作人员分配上实行“三三制”原则，即共产党员、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和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各占 1/3。

抗日民主政权十分重视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根据地内停止实行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普遍实行减租减息政策。为了克服根据地面临的严重困难局面，毛泽东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1942 年，中国共产党领导根据地军民开展了大生产运动，为坚持抗战、争取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全民族抗战开始后，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成了革命者向往的“圣地”。中共中央及时作出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鲁迅艺术学院（简称“鲁艺”）等一批干部学校和专门学校创办起来。1940 年 8 月创办的延安自然科学学院，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开展自然科学教学与研究的专门机构。

（五）推进大后方的抗日民主运动和进步文化工作

在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先是通过中共中央长江局具体领导。1939 年 1 月以后，由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具体领导。

（六）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

1938 年 9 月至 11 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举行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这次全会上，毛泽东明确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个命题。

在 20 世纪 30 年代后期和 40 年代前期，为了将丰富的中国革命实际经验马克思主义化，以便更好地指导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毛泽东撰写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

等一批重要的理论著作。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系统阐明，标志着毛泽东思想得到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

1941年5月，毛泽东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整风运动首先在党的高级干部中进行。1942年2月，毛泽东先后作了《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讲演，整风运动在全党范围普遍展开。整风运动的主要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其中，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是整风运动最主要的任务。

整风运动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在全党范围确立了起来。

1945年4月20日，中共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党的若干重大的历史问题作出结论，使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的认识达到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一致。同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七大将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所创造的理论成果，正式命名为毛泽东思想，并将毛泽东思想规定为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空前的团结和统一。

五、抗日战争的胜利及其原因和意义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终战诏书”的形式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9月2日，在东京湾美军军舰密苏里号上举行日本向同盟国投降签字仪式。至此，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也胜利结束。9月3日被确定为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从一开始就具有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的重大意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

中国抗战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即已开始。在1939年9月大战在欧洲爆发之前，中国人民孤军奋战，英勇抗击了百万日军的进攻。中国的抗战牵制和削弱了日本的力量，使之不敢贸然北进，从而使苏联得以集中兵力对付德国，避免东西两面作战；同时也推迟了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时间，并使之在发动和进行战争时由于兵力不足而不能全力南进，从而减轻了美、英军队受到的压力。

中国坚持持久抗战，抗击和牵制着日本陆军主力，并为同盟国军队实施战略反攻创造了有利条件。

中国作为亚洲太平洋地区盟军对日作战的重要后方基地，还为盟国提供了大量战略物资和军事情报。

总之，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开展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中国是在亚洲大陆上反对日本侵略者的主要国家。中国在抗日战争中，为了自己的解放，为了帮助各同盟国，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抗日战争胜利的原因：

第一，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决定因素。

第二，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

第三，全民族抗战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重要法宝。

第四，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同世界所有爱好和平和正义的国家和人民、国际组织以及各种反法

西斯力量的同情和支持也是分不开的。美国陆军航空队退役军官陈纳德曾组建美国援华志愿航空队（即“飞虎队”）来华参加对日作战。1939年11月，加拿大共产党员诺尔曼·白求恩大夫在抢救八路军伤员时被感染，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献出了生命。

抗日战争胜利的意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20世纪中国和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为中华民族由近代以来陷入深重危机走向伟大复兴确立了历史转折点。

第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彻底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殖民奴役中国的图谋。中国人民用自己的顽强奋战和巨大牺牲，迫使日本归还甲午战争以后从中国窃取的东北、台湾、澎湖列岛等神圣领土，捍卫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彻底洗刷了近代以来抗击外来侵略屡战屡败的民族耻辱。

第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形成了伟大的抗战精神。中国人民向世界展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这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永远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强大精神动力。

第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对世界各国夺取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国人民为最终战胜世界法西斯势力作出的历史性贡献，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树立了一个以弱胜强的范例，中国国际地位显著提高。中国成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

第四，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开辟了中华民族复兴的光明前景。

第七章 为新中国而奋斗

一、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

1945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在对时局的宣言中明确提出“和平、民主、团结”的口号。

1945年，为了争取和平民主，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于8月28日偕周恩来、王若飞赴重庆与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10月10日，双方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确认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同意“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

1946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出席会议的有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青年党和无党派人士的代表38人。中共代表团与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代表密切合作，同国民党当局认真协商，推动政协会议达成五项协议。

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民主的努力，尽管最终未能阻止全面内战的爆发，但是，它使得各界群众增进了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懂得了什么人应当对这场战争承担责任。这在政治上是一个重大的胜利。同时，经过努力，中国人民毕竟争得了将近一年的和平的暂息时期。这也为扩大和巩固解放区、做好进行自卫战争的准备，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二、国民党政府处在全民的包围中

1946年6月底，国民党军以进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挑起了全国性的内战。战局的发展，从根本上粉碎了国民党统治集团的速战速决计划。1947年6月底，根据中共中央的决策和部署，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实施中央突破，千里跃进大别山；陈毅、粟裕指挥的华东野战军主力为东路，挺进苏鲁豫皖地区；陈赓、谢富治指挥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一部为西路，挺进豫西。三路大军相互策应，机动

歼敌。人民解放战争战略进攻的序幕由此揭开。

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史称“五四指示”），决定将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政策。

1947年7月至9月，中国共产党在河北省平山县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制定和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明确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

土地制度改革，是从根本上摧毁中国封建制度根基的社会大变革。为打败蒋介石、建立新中国奠定了深厚的群众基础。

国民党政府由于它的专制独裁统治和官员们的贪污腐败、大发国难财，抗战后期在大后方便已严重丧失人心。在抗战胜利时曾经对它抱有很大期望的原沦陷区人民，也很快对它感到极度的失望。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国民党政府派出的官员到原沦陷区接收时，把接收变成“劫收”，大发胜利财。国民党之所以迅速失去民心，主要是由于它违背全国人民迫切要求休养生息、和平建国的意愿，执行反人民的内战政策。国民党当局就将全国各阶层人民置于饥饿和死亡的界线上，因而迫使全国各阶层人民团结起来，同蒋介石反动政府作你死我活的斗争，除此以外，再无出路。

在国民党统治区，以学生运动为先导的人民民主运动也迅速地发展起来，成为配合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1945年底，昆明学生发动了以“反对内战，争取自由”为主要口号的一二·一运动。

1946年12月30日，抗议驻华美军暴行的运动掀起。

1947年5月20日，南京、北平等地爆发了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史称“五二〇运动”）。

1947年2月28日，台湾省台北市人民为反抗国民党当局的暴政、抗议反动军警屠杀市民，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2月底3月初，台湾各地汉族、高山族人民纷起响应，夺取武器，举行起义。二二八起义虽然失败了，但作为全国人民民主运动的组成部分，它有力地显示了台湾人民的革命精神，鼓舞了全国人民。

三、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合作

抗日战争胜利后，某些民主党派的领导人物曾经鼓吹“中间路线”，企图在国共对立的纲领之外，寻找出第三条道路。他们所提倡的，是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他们所主张的，实质上是旧民主主义的道路。

国民党当局不仅极度仇视中国共产党，而且对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也充满敌意，不断以暴力对他们施行迫害。继李公朴、闻一多在昆明遭暗杀之后，杜斌丞又在西安被杀害。1947年10月，国民党当局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明令对该组织及其成员的一切活动严加取缔。

1948年1月，民盟领导人沈钧儒等在香港召开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宣布不接受解散民盟的任何决定，并恢复民盟总部。这次会议，标志着民盟站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立场上来。其他民主党派也明确表示了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立场。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在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口号中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个号召得到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各界的热烈响应。

四、创建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

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发动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基本上摧毁了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

主要军事力量。三大战役，无论是战争的规模还是取得的成果，在中国战争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战争史上也是罕见的。这是人民战争的胜利，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胜利。

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宣告延续了22年之久的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

1949年3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指出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两个务必”的思想，即“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毛泽东把进北平比作“进京赶考”，说“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为了向全国人民公开阐明中国共产党在建立新中国问题上的主张，在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的前夕，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和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构成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基础。

完成创建新中国的任务，是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来承担的。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毛泽东在开幕词中向全世界豪迈地宣告：“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在当时是全国人民的大宪章，起着临时宪法的作用。人民政协的召开，标志着中国的新型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确立。

五、中国革命胜利的原因和基本经验

中国革命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它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和雄厚的群众基础。

没有广大人民和各界人士的广泛参加和大力支持，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走上胜利发展的道路，是由于有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中国人民基于自己的切身体验所确认的客观真理。

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赢得胜利，同国际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也是分不开的。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革命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锻造出了有效的克敌制胜的武器。毛泽东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毛泽东在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历史道路时指出：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

下编综述 辉煌的历史进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宣告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已经到来，具有五千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从此进入了发展进步的历史新纪元。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基本的胜利，标志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结束和新民主主义社会在全国范围内的建立。这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伟大胜利。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的第一项历史任务，即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任务基本上完成了。这就为实现第二项历史

任务，即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创造了前提，开辟了道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党领导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要建立以中国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然后，再使之发展到第二阶段，以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即进入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

新中国成立以后至今的历史，经历了以下的发展阶段：

从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6年，是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中国共产党制定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团结带领人民在推进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同时，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

从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夕，是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

从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

从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而从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至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在徘徊中前进的两年，为实现新时期的伟大历史转折准备了条件。

2012年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

在六十多年中，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探索、开创、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这一历史任务而不懈奋斗，这是新中国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二十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为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积累了条件，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是对前一个时期的坚持、改革、发展。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正确认识和处理改革开放前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的关系，不只是一个历史问题，更主要的是一个政治问题。

新中国最大的历史成就，就是探索、开创、坚持、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几代中国共产党人接续奋斗的结果。

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进入新时代的历史背景：一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取得重大成就基础上，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发展站新的历史起点上，新起点需要新气象新作为；二是世界进入大变革大调整时期，面临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何在乱局中保持定力、在变局中抓住机遇，对我们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提出了更高要求；三是中国共产党执政面临的社会环境和现实条件发生深刻变化，发展理念和方式有重大转变，发展水平和要求更高；

四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经济建设仍然是中心任务，但需要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需要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五是从党的十九大到二十大，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我们要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之后，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目标进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内涵：这个新时代，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是全体中华儿女勠力同心、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上、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也具有重大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 21 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第八章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的确立

一、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开始

新中国在成立初期，面临着许多严重的困难和一些紧迫的问题。这对于刚刚执掌全国政权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是新的严峻的考验。主要是：

第一，能不能保卫住人民胜利的成果，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

第二，能不能战胜严重的经济困难，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

第三，能不能巩固民族独立，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

第四，能不能经受住执政的考验，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和艰苦奋斗的作风。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着重抓了以下四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

第二，领导国民经济恢复工作。

第三，巩固民族独立，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建国初期，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的外交方针。1950 年 6 月，朝鲜战争爆发。1950 年 10 月，志愿军赴朝作战。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为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改革赢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

第四，加强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1951 年底到 1952 年，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处决了犯有严重贪污罪行的刘青山、张子善。1952 年上半年发起“五反”（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窃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经济情报）运动。这些举措对于在执政的条件下继续保持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促进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廉政建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初三年，即 1949 年至 1952 年期间，在着重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的同时，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实际上也开始实行了。

二、社会主义道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

由于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促进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的优越性，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来说，通过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国家工业化，这是最好的选择。

中共中央于 1953 年正式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明确规定“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当时中国之所以要着力进行和可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主要是因为：

第一，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力量相对来说比较强大，它是实现国家工业化的主要基础。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国家独立和富强的当然要求和必要条件。随着没收官僚资本工作的完成和工业建设的初步开展，中国已经有了比较强大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那时工业建设的发展，首先就意味着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的发展和它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比重的增加。这是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因素。

第二，资本主义经济力量弱小，发展困难，不可能成为中国工业起飞的基础。而且，它对国家和国营经济有很强的依赖性，不可避免地要向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向发展。在帝国主义对华封锁的情况下，民族资本由于向外发展的渠道被阻断，就更加重了它对国家和国营经济的这种依赖性。这是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的又一个基本因素。

第三，对个体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保证工业发展、实现国家工业化的一个必要条件。

第四，当时的国际环境也促使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当时只有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争取民族独立而斗争的国家同情中国。只有苏联能够援助中国。这种国际环境，也是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的基本因素之一。

三、有中国特点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

（一）社会主义工业化与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

编制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工作，在 1951 年就已着手进行。1955 年 7 月召开的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这个计划。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的到 1957 年应达到的指标，在 1956 年底就提前达到了。“一五”期间，在苏联的援助下，中国着重建设了一大批基础性的重点工程，为国家的工业化奠定了初步的坚实基础。当时建成的这些大中型工业骨干企业，都是国家统一规划、统一投资的国营企业。这些建设成就，极大地加强和壮大了国营经济的领导力量，为顺利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奠定了强大的物质基础。

（二）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开创了一条有中国特点的农业合作化道路。其基本原则和方针是：

第一，在中国条件下，可以走先合作化、后机械化的道路。在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后，及时将“组织起来”作为农村工作的一件大事来抓。

第二，充分利用和发挥土改后农民的两种生产积极性，通过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这种由低到高的互助合作的组织形式，实行积极发展、稳步前进、逐步过渡的方针。

第三，农业互助合作的发展，要坚持自愿和互利的原则，采取典型示范、逐步推广的方法，发展一批，巩固一批。

第四，要始终把是否增产作为衡量合作社是否办好的标准。

第五，要把社会改造同技术改造相结合。在实现农业合作化以后，国家应努力用先进的技术和装备发展农业经济。

到 1956 年底，农业合作化基本完成。对个体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 1955 年夏季以后，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较长期间遗留了一些问题。尽管如此，农业合作化在总体上是成功的。中国农村在发展稳定的气氛中完成了从几千年的分散个体劳动向集体所有、集体经营的历史性转变。

在推进手工业合作化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采取的是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手工业合作化的组织形式，是由手工业供销合作小组、手工业供销合作社到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步骤是从供销入手，由小到大，由低到高，逐步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生产改造。到 1956 年底，手工业的合作化也基本完成了。

（三）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赎买政策的实施

中国资产阶级有两个部分，即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他们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对官僚资产阶级即中国的大资产阶级，是把他们作为敌人，在政治上推翻他们的统治，在经济上没收他们的资本。民族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仍然具有两面性。他们既有剥削工人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对民族资产阶级，是把他们作为朋友，在团结他们的同时，用和平的方法逐步地改造他们。

对资本主义工商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就是要把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并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赎买政策。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了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

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逐步完成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经之路。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的，用各种形式和国营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的，并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经济。它有初级形式和高级形式的区别。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企业仍由资本家经营，它同国营社会主义经济通过订立合同等办法，在企业外部建立这样那样的联系。其形式，在工业中有收购、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在商业中有经销、代销、代购代销、公私联营等。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就是公私合营。实行公私合营以后，原来的资本主义企业同社会主义经济的联系已经不仅限于流通领域，而是深入到了企业内部，深入到了生产领域。

新中国成立初期，着重发展的是加工订货、经销代销等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1954 年 1 月以后，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起来。开始时，主要是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在这种合营企业中，公方代表已经居于领导地位。企业利润采取“四马分肥”的办法，即分为国家所得税、企业公积金、工人福利费、股金红利四个部分。企业收益大部分归国家和工人，资本家所得不足 1/4。这种企业已经具有不同程度的社会主义性质。1955 年，一些行业先后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这时，国家对资本家原有的生产资料进行清理估价，以核实私股股额；在合营期间，每年发给资本家 5% 的股息，这就叫定股定息。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

这些企业基本上已经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除资本家领取定息外，同国营企业已经没有原则的区别。1956年年底，全国私营工业户的99%、私营商业户的82.2%，都走上了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道路。

经过国家资本主义来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意味着国家对资本家采取和平赎买的政策。对资产阶级实行赎买，这是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设想。十月革命后，列宁打算在俄国对“文明的资本家”采取这种做法，但俄国资产阶级不接受。中国共产党把这种设想付诸实施并取得成功。

在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的时候，国家为资本家安排了工作，许多人担负了一定的领导职务。

（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的全面确立

1954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大会讨论并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新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从此建立。这成为新中国人民民主政治建设发展历程中具有标志性的事件。

在逐步推进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中国的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得到了全面确立和进一步发展。

到1956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中国继建立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之后，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也建立起来了。这是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最主要的标志。

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为中国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基础，开辟了道路。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这就使社会生产力从旧的生产关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取得比资本主义更快更好的现代化发展速度铺平了道路。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第九章 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

一、良好的开局

1956年，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全面确立，标志着中国进入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阶段。

1956年毛泽东提出的关于实行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的任务，为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供了基本的指导原则。

毛泽东先后在1956年4月25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5月2日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这十大关系，围绕一个基本方针，即：“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论十大关系》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标志，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从经济方面和政治方面提出了新的指导方针，为中共八大的召开作了理论准备。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中共八大正确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指出：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还有阶级斗争，还要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但根本任务已经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

在经济建设上，大会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在政治建设上，提出要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使党和政府的活动做到“有法可依”和“有法必依”。在执政党的建设上，强调要提高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水平，健全党内民主集中制，坚持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

在大会发言中，陈云提出“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即：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为补充；计划生产是主体，一定范围的自由生产为补充；国家市场是主体，一定范围的自由市场为补充。这个思想为大会所采纳，并写入大会决议，成为探索适合中国特点的经济体制的重要步骤。

中共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它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同年12月，毛泽东提出，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并把这称作“新经济政策”。

1957年2月，毛泽东在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了《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讲话，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还存在着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必须区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他系统地阐明了正确处理各种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和方法。强调不能用解决敌我矛盾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只能用民主的、说服的、教育的、“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去解决。

毛泽东还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作了科学分析。他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自我调整和自我完善不断地得到解决。这实际上为进行改革，使社会主义制度得到完善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石。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1957年6月19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是一篇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它创造性地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发展，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二、探索中的严重曲折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在宣传中和实际工作中片面地突出了“快”字，产生了消极的后果。在总路线提出后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

毛泽东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又是中共中央领导集体中较早地觉察并实际纠正“左”倾错误的领导人。

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中共中央在江西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7月14日，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着重指出“大跃进”存在的严重问题和突出矛盾。毛泽东错误地对彭德怀的信提出尖锐批评。8月2日至16日，毛泽东在庐山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作出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随后在全党范围开展了“反右倾”斗争。这场斗争，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建设上打断了纠“左”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

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斗争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撤走

全部专家，中国国民经济在 1959 年到 1961 年发生严重困难。

1961 年 1 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毛泽东在会上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国民经济转入 1962 年至 1965 年的三年调整时期。

1962 年 1、2 月间，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恢复和发扬了党内的民主精神和自我批评精神，统一了全党的认识，对全面贯彻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1964 年底到 1965 年初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1966 年 5 月至 1976 年 10 月的“文化大革命”，是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它使中国共产党、国家和人民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是要反对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寻求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是曾被概括成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他在晚年提出的这些理论及其实践严重地背离了客观实际，明显地脱离了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并被林彪、江青、康生等人所利用。

1965 年 11 月 10 日，姚文元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上海《文汇报》发表，成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1966 年 5 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系统地阐发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

同年 8 月 1 日至 12 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并在全会上印发《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再发动。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方针。

1967 年 2 月前后，在有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和中共中央军委领导人参加的不同会议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提出强烈的批评。然而，这次抗争却被诬称为“二月逆流”而遭到压制和打击。

1969 年 4 月 1 日至 24 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次大会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中共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

林彪等人于 1971 年 9 月 13 日凌晨仓皇出逃，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温都尔汗附近坠机身亡。发生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事件，是“文化大革命”推翻党的一系列基本原则的结果，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

1973 年 8 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继续了中共九大的“左”倾错误方针。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

1975 年 1 月 13 日至 17 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蓝图。会后，周恩来病重，邓小平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

1975 年，邓小平着手对各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形势开始有了明显好转。这次整顿实际上是后来拨乱

反正的预演。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举国悲痛。清明节前后，爆发了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运动。这场运动实质上是拥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并为后来粉碎“四人帮”奠定了群众基础。

同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10月6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

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中国共产党在独立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发生的严重曲折，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归根结底，并不是由社会主义根本制度本身所造成的，而且依靠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完全可以纠正的。

“文化大革命”之所以会发生并且持续十年之久，有着复杂的多方面的原因。

由于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不长，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更短，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有待于继续探索。中国共产党过去长期处于战争和激烈的阶级斗争的环境中，对于迅速到来的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全国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因此，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并没有完全搞清楚。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特点，在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新矛盾新问题时，容易把已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仍然看作是阶级斗争，习惯于沿用过去进行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群众性斗争的旧方法和旧经验，从而导致阶级斗争的严重扩大化。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迷误当成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所谓继承和发展，把党内不同意见的正常争论当作两条路线的斗争，甚至直接说成是阶级斗争。

在探索中出现的一些失误，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遭到了严重破坏，致使党无法依靠制度的和集体的力量及时地发现并纠正错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由于没有正确解决领袖和党的关系问题而出现过的严重偏差，对中国共产党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中国是一个封建历史很长的国家，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仍然不是很容易肃清的。种种历史原因又使得中国共产党没有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获得应有的权威。这就提供了一种条件，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这样也就使党和国家难于防止和制止像“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错误的发生和发展。

对错误进行科学分析对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所犯的错误的，需要做具体的、历史的分析。

三、建设的成就探索的成果

（一）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

这一时期最大的建设成就，是基本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根本上解决了工业化中“从无到有”的问题，使中国在赢得政治上的独立之后赢得了经济上的独立，为中国以后的发展奠定了牢固的物质技术基础，而且也为中国同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下发展对外贸易和经济往来创建了前提。

（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与文化、教育、医疗、科技事业的发展

在全国人民节衣缩食支援国家工业化基础建设的情况下，尽管人民群众生活逐年改善的增幅不大，但初步满足了占世界 1/4 人口的基本生活需求，这在当时被世界公认是一个奇迹。

新中国在核技术、人造卫星和运载火箭等尖端科学技术领域，取得一系列重要的成就。1964 年 10 月 16 日，中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1967 年 6 月，爆炸了第一颗氢弹。1970 年 4 月，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

（三）国际地位的提高与国际环境的改善

1950 年至 1953 年的抗美援朝战争，以及随后召开的日内瓦国际会议和万隆会议，极大地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中国同印度、缅甸等国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处理国与国关系的公认的国际准则。1971 年 10 月恢复了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1972 年 2 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同年 9 月，中日两国发表关于建交的联合声明。随着中美关系开始正常化，1972 年出现了西方国家对华建交热潮。

（四）探索中形成的建设社会主义的若干重要原则

关于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

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和步骤，毛泽东强调：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大力推进中国的现代化事业。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是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强国。为此，应当采取“两步走”的发展战略，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中国的经济走在世界前列。

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毛泽东提出，要实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方针，正确处理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以农、轻、重为序发展国民经济；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坚持工业和农业并举、重工业和轻工业并举、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并举、大中小企业并举等“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利用价值规律；正确解决好综合平衡的问题，处理好积累和消费、生产和生活的问题，处理好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统筹兼顾，适当安排。

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方面，毛泽东提出，要把“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作为努力的目标；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坚持人民民主，尽可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处理好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的关系，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切实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各项权利，尤其是人民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的权利；社会主义法制要保护劳动人民利益，保护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保护社会生产力。

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方面，毛泽东提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化实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要实行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又红又专的方针；知

识分子在革命和建设中具有重要作用，要建设一支宏大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要向科学进军，不能走世界各国发展科学技术的老路，而应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努力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在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方面，毛泽东提出必须加强国防、建设现代化正规化国防军和发展现代化国防技术的重要指导思想，还提出国防建设要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的方针，并为巩固国防制定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

在执政条件下加强共产党自身建设方面，毛泽东最早觉察到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战略的危险，号召共产党人提高警惕，同这种危险作斗争。同时，他又十分警惕党在执政以后可能产生的种种消极现象。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艰辛探索，积累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以创造性的内容为马克思主义宝库增添了新的财富。这些思想成果，为党继续进行探索并系统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第十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与接续发展

一、历史性的伟大转折和改革开放的起步

1977年8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文化大革命”结束，重申20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本任务，但仍然肯定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

邓小平同叶剑英、陈云、李先念、胡耀邦等支持和领导了从1978年5月开始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场讨论，是继延安整风之后又一场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运动，成为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思想先导，为党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纠正长期以来的“左”倾错误，实现历史性的转折作了思想理论准备。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邓小平在闭幕会上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这个讲话实际上成为随后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它为全会实现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转折奠定了重要基础。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冲破长期“左”的错误的严重束缚，彻底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并且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全会恢复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审查解决了历史上遗留的一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全会结束了粉碎“四人帮”后党和国家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开始了在思想、政治、组织等领域的全面拨乱反正。会后，从党的指导思想的确立和实际工作的领导来说，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中央领导集体，揭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以这次全会为标志，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

经济体制的改革，首先在农村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在中共中央的支持和推动下，以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为主要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各地逐渐推广开来，促进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的解体。这期间，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也开始了。对外开放也迈出了较大的步伐。1980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

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立经济特区。

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理论务虚会上发表的讲话中指出：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这对排除来自“左”的和右的方面的干扰和影响，保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提供了可靠的政治基础，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从1979年11月起，在邓小平主持下，中共中央着手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经过一年半时间的讨论和修改，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这个决议。决议从根本上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对新中国成立以来重大历史事件作出了基本结论。决议科学地评价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决议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和活的灵魂（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作了概括，强调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

决议的通过，标志着党和国家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胜利完成。

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展开

1982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在开幕词中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共十二大提出，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大会根据邓小平的设想，提出了国内工农业年总产值在20世纪末翻两番的奋斗目标。

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观点，指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我国的对外开放也进一步扩大。1983年4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对海南岛实行经济特区的某些政策，给予较多的自主权，以加速海南岛的开发，并于1988年4月建立海南省，将全海南岛辟为经济特区。

1984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进一步开放天津、上海、大连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1985年2月，决定把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南厦（门）漳（州）泉（州）三角地区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这样，就逐步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这样一个多层次、有重点、点面结合的对外开放格局。

198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完整地概括了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制定了下一步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任务和奋斗目标。中共十三大正式制定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战略部署：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这个任务已经基本实现；第二步，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跨世纪发展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先后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重要谈话。

邓小平强调，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

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他指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邓小平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他强调，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邓小平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邓小平指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

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在重大历史关头科学地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明确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对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1992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确立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概括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大会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以邓小平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为标志，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新阶段。

1993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将中共十四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和基本原则具体化，进一步勾画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明确了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方向，成为20世纪90年代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行动纲领。

1997年2月19日，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逝世。同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的主题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大会把邓小平理论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道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修改后的《中国共产党章程》。

中共十五大在世纪之交的关键时刻，继承邓小平遗志，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明确回答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继续向前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跨世纪发展提供了根本保证。

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中国的对外开放进入一个新阶段。

根据“一国两制”的构想，中国政府先后同英国和葡萄牙政府举行谈判，并分别于1984年12月和1987年4月签署了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和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1997年7月1日，中国和英国两国政府举行了香港政权交接仪式，宣告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正式成立。1999年12月20日，澳门也回归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正式成立。

1992年10月，大陆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与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举行商谈，达成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

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准确把握时代特征，科学判断中国共产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集中全党智慧，以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勇气进行理论创新，逐步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一系统的科学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完整的概念，是2000年2月江泽民在广东考察工作时提出来的。他指出：“总结我们党七十多年的历史，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这就是：我们党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为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中国共产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

四、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确定

2002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确立为中国共产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的又一次与时俱进。大会从十个方面总结概括了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验。大会明确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提出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紧紧抓住这一重要战略机遇期，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这是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必经的承上启下的发展阶段，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扩大对外开放的关键阶段。

（二）不断推动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

科学发展观，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它深刻认识和回答了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成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

（三）奋力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到新的发展阶段

200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的主题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

大会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大会一致同意将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

2008年，“五一二”四川汶川特大地震抗震救灾斗争取得重大胜利；8月至9月，在北京举办的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和第13届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取得圆满成功；9月，神舟七号载人飞船航天任务顺利完成；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取得积极成效。

由于党和国家科学判断、果断决策，采取一系列重大举措，使中国在全球率先实现经济企稳回升，积累了有效应对外部经济风险冲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重要经验，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自 2002 年到 2012 年的十年间，我国社会生产力、经济实力、科技实力迈上一个大台阶，人民生活水平、居民收入水平、社会保障水平迈上一个大台阶，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国际影响力迈上一个大台阶，国家面貌发生新的历史性变化。2010 年，中国经济总量上升为世界第二。

第十一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一、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

（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确定

2012 年 11 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

大会指出科学发展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道，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大会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布局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的科学内涵及其相互关系；明确提出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必须牢牢把握的八项基本要求，要求全党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大会提出要在党的十六大、十七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基础上努力实现新的要求，即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人民民主不断扩大，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确保到 2020 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

大会要求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为主线，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中共十八大精神归结到一点，就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十八大强调：我们必须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中共十八大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已经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二）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提出

中共十八大结束不久，习近平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明确提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步。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共同为之努力。2013 年 3 月 17 日，习近平在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进一步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

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实现中国梦必须凝聚中国力量。

（三）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提出并形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这个战略布局既有战略目标，也有战略举措，每一个“全面”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保障。

2013 年 11 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2014年10月，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2015年10月，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全会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的目标要求。全会强调实现“十三五”时期发展目标，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必须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党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采取全方位、高标准的管党治党举措，开创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局面。

2012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

2016年10月，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举行。全会审议通过《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全会明确习近平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全会号召全党同志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定不移维护党中央权威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二、党和国家事业的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

中共十八大以来五年的成就是全方位的、开创性的，具体体现在：经济建设取得重大成就；全面深化改革取得重大突破；民主法治建设迈出重大步伐；思想文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显著；强军兴军开创新局面；港澳台工作取得新进展；全方位外交布局深入展开；全面从严治党成效显著。

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是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的结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的结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结果。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举旗定向、运筹帷幄，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砥砺前行，以巨大的政治勇气，有效应对国际国内诸多风险和挑战。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是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的根本政治保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的国际地位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正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五年来，中国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

三、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2017年10月18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这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大会的主题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大会通过的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的报告，描绘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宏伟蓝图，进一步指明了党和国家事业的前进方向，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是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

中共十八大以来，国内外形势变化和我国各项事业发展提出了一个重大时代课题，这就是必须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围绕这个重大时代课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进行艰辛理论探索，取得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明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 21 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明确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是“五位一体”、战略布局是“四个全面”，强调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明确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明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明确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是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明确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突出政治建设在党的建设中的重要地位。这“八个明确”，构成了系统完备、逻辑严密、内在统一的科学体系，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重要、最核心的内容。

大会提出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即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一、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全面从严治党。这“十四个坚持”，是对党的治国理政重大方针、原则的最新概括，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相统一、战略与战术相结合，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路线图”和“方法论”。这“十四个坚持”，既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实践要求。

大会强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发展。

大会通过的党章修正案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党的行动指南，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又一次与时俱进。这是党的十九大一个重大历史贡献。

大会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我们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

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

大会强调，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全党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牢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这个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

大会强调，从十九大到二十大，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我们既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又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

大会指出，综合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和我国发展条件，从 2020 年到 21 世纪中叶可以分两个阶段来安排。

第一个阶段，从 2020 年到 2035 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 1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第二个阶段，从 2035 年到 21 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 15 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安排。

中共十九大对新时代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作出全面部署。大会强调，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相互作用，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大会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一定要有新气象新作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是：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以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为主线，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坚定理想信念宗旨为根基，以调动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着力点，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大会强调，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全党必须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2018 年 3 月，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确定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指导地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是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指导党和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勇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

结束语：怎样正确认识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就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谱写了气吞山河的壮丽史诗，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一、中国人民是如何站起来的

（一）中国人民站起来的历史进程

（1）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及其对国家出路的早期探索。

（2）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并未挽救中国。

（3）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二）中国人民站起来的基本经验和启示

总结近代中国的历史，中华民族能够获得解放，中国人民能够站起来、掌握自己的命运最关键的经验与启示是：有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有科学理论的指导，开创了正确的革命道路。

二、中国人民是如何富起来的

（一）中国人民富起来的历史进程

（1）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2）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30年社会主义建设、探索为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积累了条件。

（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一步步富起来。

（二）中国人民富起来的基本经验与启示

总结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中国人民能够从站起来到富起来，最关键的经验与启示是：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党的领导和不断加强党的建设。

三、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也是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起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方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上、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也具有重大意义。